



新闻界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ISSN 1007-2438, CN 51-1046/G2

《新闻界》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
作者：吴璟薇，阎庆宜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0629.001
网络首发日期：2023-07-04
引用格式：吴璟薇，阎庆宜. 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J/OL]. 新闻界. <https://doi.org/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0629.00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¹⁾

吴璟薇 阎庆宜

摘要 法国媒介理论学者米歇尔·塞尔所建构的传播哲学，诠释了媒介中介性、噪音与混沌等信息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而打破了传统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界限，成为德法媒介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以塞尔思想中的“信使”形象为主轴，通过描绘其所创建的“信使研究计划”来透视其传播哲学思想，并以作为本体论和作为方法论的赫尔墨斯为思考维度来勾勒其建立的“关系哲学”。在此基础上，将塞尔的传播思想与德布雷和克莱默尔等其他欧陆媒介学者的思想进行关联和对话，并思考在信使自身形式越发多元、媒介社会环境越发混乱的当下，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米歇尔·塞尔；赫尔墨斯；信使；噪音；传播哲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吴璟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4；阎庆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一、塞尔其人及学术历程

作为法国当代思想界独一无二的“全面型”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思想和论述极富启示性与诗意^[1]。1930年，塞尔出生于一个农民、水手家庭。年轻时进入海军军官学校，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得数学、文学和哲学学位，并在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门下进行数学史研究。二战期间广岛原子弹爆炸等系列事件促使塞尔的关注焦点从数学转向哲学，从理科转向文科，去思考科学乐观主义的迫切问题^[2]。1968年，应福柯(Michel Foucault)之邀，塞尔短暂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1969年开始，塞尔在巴黎的索邦大学担任科学史教授直至1996年退休。此后，塞尔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诸多大学授课，并最终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法语和意大利语系教授直至2019年去世。

塞尔的哲学著作始于对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关于百科全书、创造和交往等论题的研究，但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数学、信息理论和生物化学等新兴科学范式的影响下，他开始反思知识的二元化断裂，并着手建构自己的跨学科理论实践体系。教育经历的波折和学术历程的转变使得哲学、文学、科学、宗教乃至神学都融入了他的思想，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学科的既定界限。塞尔毕生出版著作70余本，主题涉及天地、宇宙、自然和人类等世间万象，致力于在浩瀚广博的对象和事件之间建立不可思议的连接。

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媒介技术观研究”(21YJC860022)。

但塞尔却不曾停留在独立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从而难以通过单一的思想主轴综括其思想全貌，尤其略显晦涩的诗性文笔和百科全书式的发散思维，又增加了阅读其著作的门槛^[3]。此外，因为塞尔的作品非常依赖法语声韵，所以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翻译^[4]。因此，无论是英语学界还是法语学界对塞尔思想的重视都较为有限^[5]，对中文学界来说就更是如此。

199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蒲北溟翻译的《万物本原》，拉开了塞尔思想引介至中国的序幕。新世纪以来，《拇指一代》《生地法则》等塞尔的代表作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也偶有学术文章从身体哲学、传播哲学、伦理哲学和生态哲学等领域切入对其思想进行了介绍和阐释^①，但这些著作大多局限于特定学科主题，所引起的反响整体有限，塞尔思想的巨大价值意义仍未被中国大陆学术界完全发现。相比之下，塞尔的思想在中国台湾地区近年来颇受重视，图书出版和研究论文都呈井喷态势。目前，台湾地区译介了《寄食者：人类关系、噪音、与秩序的起源》《剧变的新时代》《米榭·塞荷的泛托邦》等书籍，除此之外，诸多文献也对塞尔一生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剖析^②。其中，2022年齐昀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沟通理论到自然契约：塞尔哲学的考察》^[6]则最早立足于跨学科的十字路口，在塞尔浩瀚广阔的思想中勾勒出其传播理论的概貌，为传播学界继续挖掘作为塞尔思想“主轴”的传播哲学奠定了基础。

即使塞尔本人及其作品始终在全球学界少有讨论，但这位被普遍忽视的科学哲学家却是拉图尔（Bruno Latour）、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和德布雷（Régis Debray）等诸多社会

学家和媒介学家思想的重要灵感源泉。如果我们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科学技术研究（STS，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理论的主张过于大胆和陌生，难以被清晰地阐释而使外界顺利接受，那么我们就需进行理论溯源，回归到拉图尔和卡龙（M. Callon）^③等非现代哲学家的“塞尔”思想源头，从而为把握当下关联混杂的社会现状提供理论工具。此外，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思想打破了传统上泾渭分明的传播界限，将噪音/寄食者纳入传播节点，开启了对传播和社会关系的全新想象，从而对整个人文学科的思想转型与理论建设都具有了意义非凡的启迪作用。

在1993年法文版的《天使传说》^[7]中，塞尔将其思想依据不同认识论主题分为三类：能量与形变、平衡与根基以及涉及信息、信使和信息传播系统的传播哲学（见《莱布尼茨系统及其数学模型》《赫尔墨斯》五卷本、《寄食者》《天使传说》等）。近年来，塞尔还撰写了有关进化和人类世的相关著作。其中，传播哲学是塞尔众多著作共同探讨的主题，也是其跨学科哲学体系的轴心思想。通过梳理信使传播哲学，亦可窥见其学术思想的整体脉络。在塞尔看来，世界并非僵固的四维空间，而是各种平行时空相互重叠的混沌宇宙。只有回归原初的混沌状态，以信使为主轴在不同时空建立联系，才会产生新的可能和秩序。因此，本文将着重关注塞尔对传播哲学主题的研究，以信使计划为切入口来勾勒其传播思想蓝图。

二、“信使”传播哲学的意涵

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作者都会在片头列出人物名单。在几千年的戏剧中，猜猜哪个人

①如徐明. 米歇尔·塞尔的编织美学对学科融合的启示[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0(03):200-210; 基思·莫泽, 高砚平. 通过“身体性想象”重思生物圈——米歇尔·塞尔的感官哲学[J]. 外国美学, 2020(01):142-153; 孟强. 米歇尔·塞尔论自然契约[J]. 世界哲学, 2011(05):133-139; 王佳璐. 论塞尔“寄食者”理论话语及其跨界诗学意义[D].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②如许宏儒. 论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荷之“第三者”概念及其教育哲学意涵[J]. 市北教育, 2011(40); 陈荣泰. 从行动者-网络到寄食者-客体: 对 Michel Serres 的非策略式诠释[D]. 台湾清华大学, 2010.

③卡龙是法国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主要提出者。

物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信使，无论他在剧中角色的名字是什么^[8]。

——Michel, S. *Branches: A Philosophy of Time, Event and Adventure*:130.

1967年11月25日，在索邦大学法国哲学协会一次不寻常的会议^①中，时任讲师的塞尔发布了令人震惊的“信使研究计划”^[9]。塞尔指出，伴随着20世纪中期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革命，由媒介力量指导的社会正在取代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世界，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劳动生产工作转变为从事信息传播（如广告、贸易、运输、写作、演说和旅行等）工作。对此，塞尔以古希腊神话与哲学思想来做隐喻：如果说身背地球、双肩顶天的阿特拉斯（Atlas）象征农业时代维持形式的劳动，为人类取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则象征工业时代转变物质的劳动。那么在传播型社会正在取代生产型社会的当下，赫尔墨斯（Hermès）已经取代普罗米修斯成为信息时代传播工作的守护神。

在此意义上，传播成为塞尔思想的轴心，也是其所认为当下世界运行的核心原则和根本遵循。塞尔敏锐地观察到，“交流、翻译和混合”等传播概念为跨学科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科学哲学等学术场域的发展已落后于社会现实，从代数学和拓扑学里产生的结构主义也未获得合适的哲学表达，学界仍然遵循彼此割裂、隔绝的二分传统。因此，他提出的信使研究计划不仅是要创建全新的传播模式，更是要通过实现人文和科学的融合来反抗当时法国学术场域对于社会现实的“过时”认知。如同四个世纪前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为新科学哲学的建立而斗争一样，塞尔同样在工业

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的跨时代节点预见到了信息传播重要性的骤升，并认识到创建跨学科知识模型的紧迫性，从而为打破不同学科界限、建立以信息传播为框架的全新思维范式大声疾呼。

信使研究计划提出后，塞尔通过推出一系列著作建立了泛托邦（pantopie）^②的认识论体系，旨在以“信使”计划为主轴，通过塑造以理性、正义和爱为根基的“新的新科学精神”搭建科学、艺术、法律和宗教等多个知识领域的联通桥梁^[10]来实现所有学科间的融汇贯通。而传播则是联通不同学科领域的“交通道”，其传播哲学是致力于对“交通道”的理论建构。在信使研究计划中，赫尔墨斯作为信息转译者、指挥者、生产者和交易者在其传播思想体系中占据轴心地位。同时，赫尔墨斯的形象也是塞尔本人的化身，通过穿梭于不同的世界和时代，在完全不相干的对象和事件中建立起联系^[11]。拉图尔从本体论与方法论层面的“赫尔墨斯”研究面向出发，将塞尔的信使研究划分为：作为研究客体的赫尔墨斯和作为研究方法的赫尔墨斯两个时期。

（一）作为研究客体的赫尔墨斯

1. 信使、天使和赫尔墨斯。信使（messenger）的希腊文是 αγγελος（angelos），意为天使（angel）。所以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宗教神学传统中，使者通常是以天使的形象出现的。塞尔的“信使”隐喻也从中世纪的天使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天使和信使在本质上是存在共性的，他们都是上帝的“使者”。赫尔墨斯是塞尔创建的第一个信使形象^③，他源于古希腊神话。作为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赫尔墨斯是宙斯（Zeus）的传旨者和信使，因而成为邮差的守护神。又因为传说赫尔墨斯偷了阿波罗（Apollo）的牛，最

① Georges Canguilhem 在讨论中评论说，该讲座可能违反了法国哲学协会会议的惯例，因为所呈现的不是已完成的、已经发表的研究的结果，而只是一个丰富的工作计划。

② pantopie 系塞尔自造的单词，该词首先来自希腊语 pantopos，意为“所有的地方”，同时 pantopie 结尾 -topie 也是乌托邦（utopie）的后一部分。塞尔用“泛托邦”一词，表达的正是试图周游所有知识领域，以达到一种人类知识全论（pantology）的理论理想。

③ 塞尔所指的“figure”同时涉及法语中人物、外形和图形等含义和英文中数字符号、代数等含义。figures 作为塞尔创造出的“概念式人物”，在人物形象运作时通过算子方式来去中介、变化与开启新语境。

后用琴交换了牛而成为小偷和商人的守护神。赫尔墨斯通过传播、旅行和交易三种活动自由地穿梭于异质时空中，横穿噪音、传递信息，并在事物间创造联系^①。

在1969年至1980年出版的《赫尔墨斯》五卷本中，塞尔将赫尔墨斯建构为一个积极、灵活的传播、中介和转译的隐喻形象，奠定了本体论视角下的赫尔墨斯研究基调。在塞尔看来，赫尔墨斯穿梭于自由时空，搭建、调解或改变不同的人、物、事件间的关系，从而开辟新的确定或发现的途径，源源不断地提供创新的可能性^[12]。

在《赫尔墨斯》五卷本之后，塞尔继续将赫尔墨斯作为研究客体，通过创造“代班者”或是“替换者”的方式，发展并扩充了赫尔墨斯的概念及其代表人物，将“(被排除)的第三者”“寄食者”“鬼牌小丑”等角色均收纳于赫尔墨斯形象之下，使其包含无数个塞尔所建构的“思想的形象”。这些“概念型人物”^②兼具“个体性、专门性和一般性”，在一般整体和特别个例之间搭建起“桥梁”^[13]，通过对特殊个体形象的把握，以演算的方式将一个极小的概念代入到具体的场景之中，从而能够去理解“赫尔墨斯”本体论研究的核心。

2. 天使：超越赫尔墨斯的信使。20世纪90年代前，赫尔墨斯作为信使的隐喻，其意涵与宗教神学中的天使大致相同。塞尔在这一时期关于信使计划的相关工作主要是借鉴控制论和热力学等领域的知识对信息传播系统开展研究，提出了“信息物理理论”^③，并从流体波动等角度预见到了未来信息传播复杂紊乱、混乱无序的转变趋势。但伴随着近年来信息传播技术的加速发展变化，赫尔墨斯时期以电子媒介为主导的信息传播思想已不能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去中心化”的传播系统和全球通信格局。

因此，单一性的赫尔墨斯被多元化的“天使”所取代。在《天使传说》中，塞尔以希腊问答体的方式区分了赫尔墨斯和天使间的细微差别：

为何要在今天对天使产生兴趣呢？

因为我们的宇宙是围绕信息传播系统建构的。作为信息传播者，天使比单一的、作为骗子及小偷的赫尔墨斯更为庞大、复杂且细致化。^[14]

塞尔认为，天使本质上是超越赫尔墨斯的信息传递者（信使），他^④是寄生者的对立面，后者干预、干扰、扰乱并扭曲天使所传递的信息。天使则象征完全忠诚、中立且透明的中介。正如塞尔所言：“主的使者出现是为了更好地在带来主的道之前消失。”^[15]他们只是将信息从信源传递到信宿然后消失，并尽可能地减少噪声或寄生虫的干扰，保持信息的本真含义。在此过程中，作为中介的信使必须即时消失，传播才能取得成功。一旦中介出现并且保持在场，就会导致传播失败^[16]。

天使的概念作为有效、中立和透明的中介隐喻，为信息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介提供了类比模板。对塞尔来说，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媒介和与他人交往的方式都是基于更古老的仪式、信仰和做事方式^[17]。从媒介考古学视角来看，中介（媒介）的忠诚、中立问题并不是通信技术发展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它以阿特莱斯（Atlas）和普罗米修斯为象征的农业和工业社会就早已存在，信息技术革命只是一定程度上使中介、传播和转译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普遍。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中，看似古老的天使概念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新的天使在组织我们的传播实践。因此，任何媒介哲学研究都要回归宗教神话，以天使学为源头。信息技术使充当天使角色的媒介更加多元，天使的概念内涵得到极大的延展。除了从事信息传递工作的政治家、教师、记者等人士可以是天使外，每个人类个体都是

①此外，赫尔墨斯也是亡灵的摆渡神，通过游荡在人间和冥界，帮助死去的灵魂到达冥界。

②“概念型人物”最初由德勒兹提出，将其喻为哲学家的“异语同义词”。

③从信号分析、交流以及电报和电话的信息传播范畴讨论传播的理论，其主要参考了热力学及其中的“熵”概念。

④和传统天使学将天使“去势”不同，塞尔认为天使之性是沟通的核心问题，赫尔墨斯是有性的。

信息的传递者。我们像天使一样以光速与他人交流，以音速旅行，用语言改变他人和世界^[18]。此外，各种生物及非生物体，其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代表，带给世界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即是说，信息技术建构的全球网络还有物质运动和状态，都可以从传播的角度来考察。“信息通过网络构建宇宙”^[19]，这不仅是指人类建造的“覆盖全球”的人工信息传播网络，还指地球也是“由信息传播系统建构的，风和水等物质的流动能将信息传递到很远的地方”。

天使作为居间物的存在搭建了上帝和人类之间的沟通桥梁，同时让人们看到了信息在信源和信宿之间不受干扰地进行传递的可能性。但天使真的能弥合信源和信宿间的距离，将差异性转变为同一性吗？德国媒介理论学者克莱默尔在她对塞尔的评论中写到，天使的显现的确很明显地促进了人类与上帝的沟通，但同样也暗示了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不可能^[20]。传播双方存在差异是信息得以传递的前提^[21]。但传播并没有消除传受二者间的距离，而是在空间和物理距离中建立关系。天使跨越天地间的鸿沟充当人间和神界中的中介，但同时占据了天地间的第三空间，保持着鸿沟，使上帝和人类之间的分界变得更加明显。

3. 堕天使：信使计划的伦理省思。尽管二十世纪信息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对塞尔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从80年代开始，塞尔就开始逐渐关注信息技术导致的传播伦理问题。理想状态中的信使是没有实体的灵体，他们传递信息后则消失，他们是透明的、中立的。但是，当电视、电报和互联网等扮演天使角色的媒介并未消失，而是伴随其所传递的信息一起出现时，他们就成为了阻碍信息传播的噪音，成为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寄生者。亦是说，天使作为信使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穿越空间和物理距离传递信息，对抗传播过程中的背景噪音；另一方面，天使也同样可能沦为堕天使，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噪音的属性，干扰信息传播。善恶同源，天使和作为撒旦的堕天使本质上都是天使，信使这种矛盾的辩证属性只是其身份的不同面向。为了进一步探讨信使导致的传播及哲学伦理问题，塞尔在1980年出版了被称为“恶(mal)之书”^①的作品《寄食者》，以此探究当人类大量传播、交换讯息、建构各种混乱关系时，是否可能产生未曾预料到的、无法挽回的可怕后果。

(二) 作为研究方法的赫尔墨斯

和作为研究客体的赫尔墨斯时期强调“物”的面相不同，将赫尔墨斯作为方法论的研究更重视如何观察“物”的方式，换言之是对于“物”移动方式的考察，从而创造出有别于传统哲学立场的一般关系理论（或称为介词哲学）^[22]。塞尔认为，每个天使都是一种或多种关系的承载者。今天它们以无数形式存在着，人类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关系形式，但却始终没有建立这种关系哲学。

拉图尔认为，第一种赫尔墨斯算子^②通过叠合时间的方式在相距甚远的词汇和事物之间建立关系，以此勾勒出网络。塞尔将其定义为元语言。该语境的赫尔墨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有不同的意象。但这一系列概念形象都有“噪音与沟通”这一共通的双重属性。第二种赫尔墨斯算子在某种意义上优先于第一种赫尔墨斯，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综论^③，用来定义移动、位移的模式，拉图尔将其称为“元-元语言”^[23]。这种综论式的观察立场使赫尔墨斯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得以自由穿梭于时空之中，游荡在文学、科学和哲学等知识界域之间。当僵硬的空间不复存在，当时间不再是人类乃至世界历史的参

①法语的“mal”有英文“bad”（坏的、失常的）和“evil”（恶的）两种含义。塞尔以此同时描述经验事物的状态和抽象、规范的伦理意涵。

②此处的算子（opérateur）亦有多义性。opérateur在数学领域被译为“算子”，在生物领域则被译为“操纵基因”。

③是塞尔所定义的一种特有抽象、概括方式。这种综论不同于系统性或方法论上的统一，而是将一组内部差异性极强的关系整合为一个整体，见 Michel, S. & Latour, B. *Conversation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time*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103-104.

照指标时，才构成了塞尔对于事物、事件与世界的观点。

在《寄生者》中，塞尔从信息传播视角出发，以“寄生”现象为模型打破了现代哲学中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通过追溯被排斥的“第三者”^①“第三空间”构建“中间王国”，将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发展为三元关系。法语“parasite”一词至少有三方面的涵义：原意为“在…旁边吃”（para-，“在…旁”+ -sitos，“吃”）^[24]。在生物学意义上，parasite指一种以宿主为生而不以任何方式使宿主受益的微生物。在社会学意义上，parasite是与东道主同桌共食的人，大致相当于中文中的“食客”^[25]。但它不一定生活在宿主体内，而只是依附于宿主。在信息论中，parasite还指称干扰讯号传送的噪音或杂讯（约相当于英语的“static”）。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三种涵义得到综合：噪音总是扮演中断、干扰的角色。噪音寄生在声音之旁，与讯息并存^[26]，干扰信息的传递并导致信息失真。

传统的信息论将通信过程理解为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二元关系。根据香农和韦弗的说法，噪音是对通信系统的威胁，只有排除噪音才能实现传播的最佳状态^[27]。但塞尔却认为，寄食者或噪音不是来自系统外部暂时的、边缘的干扰，而是系统本身的组成部分，是两者沟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凡有讯息的地方，噪音必然存在”^[28]，信息的传递离不开噪音作为介质和背景^[29]。因为如果两者间不存在噪音，即两者处于没有任何干扰的绝对清晰的情形中，在这种零歧义环境下，发送者和接收者间的通道完全透明，无法负载新的信息内容，沟通也就没有发生的必要。由此，塞尔将被现代哲学排除在外的噪音等混杂因素重新纳入，并将之视为普遍存在的背景和交流沟通必不可少的媒介。这种噪音与沟通间的辩证关系，正如通道能引导水流，但它或多或少也阻碍水流。“沟通一但完美、成功、无暇，便不能再算是调解了。

倘若直接无间，通道便会消失。”^[30]

通过论证噪音/寄食者是信息传播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塞尔摒弃了长久以来主客孑然二分的历史传统，将视线从主客两端移至中间，强调的是“第三者”“第三空间”这种居间的状态，认为“总有中介居间其中”^[31]。作为质疑主客对立走得最远的^[32]，塞尔进一步反对现代哲学中用概念、领域来组织所有事物，主张用介词哲学改造现代思维，以表示关系的介词取代原先名词或动词的实在地位，致力于在原先不可通约的领域间建立关系网络。塞尔指出，传统哲学用实体词和动词来表达思想，但介词才是所有关系的建构和维持要素。塞尔的“信使计划”中，每一种关系都用一个独特的介词来表达：“跨越”“之间”“与”“在……旁边”。介词表示“先于”任何固定位置的关系，它们可以理解为预置的位置^[33]。因此，是关系产生了对象、存在和行为。同时，作为单词前缀的 -pre 也可理解为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预设的，至少部分地发生在预设的环境中，而不是每次都完全从头开始。介词是每一个存在产生的前提。“在存在事实之前，介词就已经存在了。”^[34]

需要注意的是，塞尔认为不能笼统地判断寄食者是系统正常运行的障碍还是系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35]。“寄食者在造成紊乱的同时还创造了新秩序”^[36]，既是传播的先决条件又是干扰传播的噪音，这一悖论使得三角关系模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们必须同时接纳和排斥第三者。以辩论为例，辩论双方不仅要就辩题互相对抗，还要联合对抗共同的敌人。为了辩论能够顺利进行，他们至少需要在两方面存在共同点：（1）就准则、规则和利害关系等保证辩论顺利进行的问题达成一致（接纳第三者）；（2）合作对抗辩论中的噪音、干扰等共同的敌人（排斥第三者）。因此，最初的三角关系被转换为四边形关系，其中包含四个节点。每当传受双方交换信息时，就会出现两个看不

①（被排除）的第三者也是塞尔“信使计划”中重要的隐喻式概念，与“寄生者”“赫尔墨斯”等隐喻形象一样能连接、转化各种事物。

见的幽灵监视该系统（称他们为“幽灵”以突出第三者即使不在场也能发挥影响的特质）^[37]。任何信息传播的中间区域都包含两个第三者，一个是被包含的第三者，他调节和中介各方；另一个是被排斥的第三者，他只是通过被排除在外或被排斥而属于这个关系，从而标志着这个关系的外部区域。

通过寄食者的隐喻，塞尔进一步延伸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以实现传播网络的去中心化思考。在“寄食者”链条相继起伏的网络关系中，塞尔认为主体、客体和第三者的位置是不断变动和转化的，而不是规定好一方作为主体对被规定为客体的另一方施行实践活动，再规定好第三者进行干扰活动。法语中的 *hôte* 一词，具有东道主和宾客的双重含义。而其词源 *hostis* 又有敌人、威胁的意义^[38]。作为宾客的第三者通过干扰来调节既存的关系，很可能重新配置整个系统，升级为东道主。在《拉封丹寓言》的《二鼠宴记乐》中，总良户寄食于农业生产行为，城市老鼠寄食于总良户的残羹剩饭，乡下老鼠又寄食于城市老鼠的请客，最终总良户发出的噪音又寄食于乡下老鼠，使它出于惊恐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乡下老鼠的惊恐也会反过来影响城市老鼠。因此，参与“寄食”链条的各方彼此寄生，呈现出同样的重要性，并通过凭借自己所寄食环境的特殊性，各节点都可能在瞬时态中构成主体和客体。

寄食现象不仅发生在偶然的中介关系中，塞尔信使计划也不仅是对单一关系链条的探讨，而是由一条条寄食链组建了动态关系网络图景。“中介是关系的存有”^[39]，每一个中介物都使网络变得可见。同时，中介的属性、功能和行为也只有作为网络的一部分时才能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将塞尔对关系网络的独创性处理方式和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话语体系进行比较，便会更清晰地把握塞尔的哲学思想。卡斯特将排斥视为维护网络统一性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网络以包容和排斥的二元逻辑作为运作机制^[40]。然而，塞尔和卡斯特对内部和外部边界的态度却迥然

不同。塞尔认为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它们可能会根据观察者的不同而改变：一个人观察到的有意义、有序的信息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噪音。例如演讲中台下观众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是干扰演讲的噪音，但如果这位观众接听了电话，演讲对电话两端的人来说就变成了噪音。卡斯特的绝对性“排斥”指的是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个人和群体。他认为被信息化社会抛弃的个体形成“第四世界”，以此产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分裂。相比之下，对塞尔来说，排斥是确保系统安全、建立关系的积极程序：只有建立边界，才能阻止干扰系统正常运作的噪音因素。此外，塞尔认为，系统皆具有排他性。如果不将寄生者拒之门外，混乱就会接踵而至。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系统内部是完全密封不可渗透的。系统设立边界，以在内部建立秩序，并将其与外部的混乱隔离开来。但所有的界面都有洞、通道、门户和孔隙，寄食者以此不断涌入。因此，虽然每个社群都是排他性的，但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扰乱、干扰、变异和中断是每个系统、网络和社区的一部分。为了维持秩序，排斥的姿态则需要不断重复；但完全将噪音排斥在外又是不可能的，人类无法彻底摆脱寄食者。寄食者依附在系统外围，制造大量噪音，然后重新配置自己所在的系统，直到一个新的寄食者出现并继续干扰系统。

三、结论与讨论

尽管塞尔的传播哲学在国内外传播学界获得的关注都较为有限，但是通过系统梳理其传播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众多当下备受关注的欧陆媒介思想的脉络渊源和理论灵感。实际上，克莱默尔和德布雷等众多德法媒介学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塞尔的影响。

作为索邦大学的博士，德布雷的著作《媒介学宣言》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塞尔则是德布雷的学位评审委员。在《媒介学宣言》中，德布雷也强调了塞尔在媒介学创立中的重要作用。在遵循塞尔信使思想和跨学科范式的基础上，德布雷主张用“介质代替信使”，以从传

播哲学过渡到媒介哲学，从而关注信息传播中的障碍或恶果^[41]。一方面，德布雷将作为中介的信使及其调节行为称为媒介，它包含着“设备-载体-方法系统”的完整体系。不同于塞尔对科学、哲学和宗教中传播问题的关注，德布雷立足于特定物质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探讨不同信息技术建构的媒介域中信使的中介作用，以梳理媒介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历史传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和塞尔的乐观主义及对媒介“中介性”的强调不同，德布雷认为天使学本质上是一种战争学，天使也没有任何可爱之处，甚至是“恶”的化身。因为媒介的信息传递和行政权力的管制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相互追击的逻辑。因此，尽管塞尔强调天使的透明性、纯洁性，但天使始终无法凭借个人意愿传递信息，他们总是受到各种势力的操纵。只要天使在场，他就象征着其背后操纵者的势力，以此成为维护统治和争夺权力的工具。因此，德布雷指出“世上既没有纯洁的介质，也没有无痛的传输”^[42]。

德国媒介学者克莱默尔的媒介思想亦受到了塞尔传播哲学思想的启发。在阐释其媒介思想的重要著作《媒介、信使和传送：传媒形而上学小引》中，克莱默尔对塞尔的传播思想及从中获得的启发进行了简要阐释。在借鉴塞尔赫耳墨斯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克莱默尔创造了“信使模型”，以强调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但和塞尔认为传受双方要共同合作消除噪音以达到传播的最佳状态不同，克莱默尔认为交流中传受双方的个体差异无法消除，但这反而能突出传播的对称性和间接性。信使的任务就是要保持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和差异，并且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塞尔关注传播和对话，认为传播是一种以仪式呈现建构关系的文化技艺。通过强调赫耳墨斯跨过鸿沟、沟通凡界和神界的能力，使天地关系以及上帝和人类边界的观念成为文化惯例^[43]。但克莱默尔更强调媒介的技术属性和文化表现，认为是媒介使信息“能够被感知”和“被看到”^[44]。她指出，赫耳墨斯的存在既维持了距离（天地之间），也保证了差异（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

传播是一个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过程，在充满天使的第三空间中，日渐增多的媒介间互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将人类实践排除在外^[45]，从而突出了由机器主导的“媒介性”。传播的物质越是技术的、不透明的，传播对话就越容易被扭曲。

伴随着媒介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兴起，近年来对欧陆媒介学思想的引介也源源不断。但塞尔作为众多媒介学家思想源泉的重要地位却始终没有得到相应重视。虽然塞尔百科全书式的思想脉络和复杂含混的语言特质使学界很难就其中特定的领域主题进行脉络展演和整体把握，但传播始终是其所编织的知识网络中的思想主轴，为清晰理解其思想体系提供了绝佳的切入口。而塞尔的关系哲学亦和中国传统思想存在对话和联结的众多可能。如塞尔所追求的充满可能性、原初本真的“混沌状态”和《老子》中的“混成”状态有共享意涵。塞尔立足于西方语境下建构的赫耳墨斯传播模型，令人联想至中国古代神话中“灶神”，其理想的信使角色功能同样和中国的“天下”哲学思想具有不谋而合之处^[46]。

此外，如今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愈发媒介化的社会已经宣告了塞尔信使研究计划预言的准确性及其对于时代脉络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精准判断。而愈发能动和自主的关系网络使全球政治和生态系统更加混乱，信使研究计划所勾勒出的自我与他者、地方和全球之间的互动关系包含了更多的张力和冲突，从而也为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域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之间的对话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因此，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塞尔的传播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结合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和实践对其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和反思，将为中国的媒介研究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资源，也能为中国媒介与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全球对话提供新鲜的养料和机遇。

参考文献

- [1][12] 史晨, 蔡仲. 拉图尔非现代哲学溯源——基于拉图尔与塞尔的对话[J]. 哲学分析, 2022, 13(01): 138-153+199.
- [2] 赵敦华, 朱德生. 西方哲学通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386.

- [3][13] 米榭·塞荷. 米榭·塞荷的泛托邦 [M]. 陈太乙, 译. 台北: 麦田出版, 2019: 封面; 103-104.
- [4] Paul G. SECOND NATURE: Michel Serres interviewed by Paul Galvez[EB/OL].[2013-09].<https://www.artforum.com/print/201307/michel-serres-interviewed-by-paul-galvez-42638>.
- [5] Watkin C. *Michel Serres: Figures of Thought*[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18.
- [6] 齐昀. 从沟通理论到自然契约: 塞荷哲学的考察 [D]. 台湾政治大学, 2022.
- [7][14][18] Michel S. *La légende des anges*[M]. Paris: Flammarion, 1993: 246; 241; 294.
- [8] Michel S. *Branches: A Philosophy of Time, Event and Adventure*[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 [9] Colin A. Le messenger[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1968, 62: 2, 56.
- [10] 莫伟民, 姜宇辉, 王礼平.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385.
- [11] 郭明哲. 20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291.
- [15][16][19][34] Michel S. *Angels: A Modern Myth*[M]. Paris: Flammarion, 1995: 106; 102; 47; 145-146.
- [17][43] Barker T. Michel Serres' Messengers[J]. *Media Theory*, 2021, 5(01): 164-184.
- [20][21] Sybille K. *Medium, messenger, transmission: An approach to media philosophy*[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 165.
- [22][33] Michel S, Latour B. *Conversation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time*[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127; 105.
- [23][24] Michel S, Latour B. *Eclaircissements: cinq entretiens avec Bruno Latour*[M]. Paris: Flammarion, 1994: 161-162; 144.
- [25][26][28][31][39] 米歇尔·赛荷. 寄食者: 人类关系、噪音、与秩序的起源 [M]. 陈荣泰, 伍启鸿, 译. 台北: 群学出版社, 2018: 79; 9; 144; 118.
- [27] Michel S, Josué V H, David F B. *Hermès: Literature, science, philosophy*[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72-73.
- [29][30][35][36][37] Michel S. *The parasite*[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78; 72; 78; 79; 9.
- [32] Bruno L.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1.
- [38] Benveniste É. *Le vocabulaire des institutions Indo-européens*[M].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9: 79.
- [40] Castells M.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51(01): 5-24.
- [41][42]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宣言 [M]. 黄春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5; 42.
- [44] 谭可可, 李承倩. 克莱默尔的文化技术媒介思想探要 [J]. 视听界, 2021(01): 32-35.
- [45] 徐生权. 媒介会甘于做一个信使么? ——论媒介的“纠缠”与“衍射” [J]. 国际新闻界, 2021, 43(11): 65-83.
- [46] 观察者网. 赵汀阳对话雷吉斯·德布雷: 未来的世界会是“天下”一统吗? [EB/OL].[2020-07-0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062554635148393&wfr=spider&for=pc>.

Communication as an Axis, Back to Chaos: The Philosophy of Messenger Communication of Michel Serres

Wu Jingwei, Yan Qingyi

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constructed by French media theorist Michel Serres illustrates the core issues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such as media mediation, noise and chaos, thus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source of German and French media theories. Taking the image of “messenger” in Serres’s thoughts as the main axis, this paper depicts the “Messenger Research Project” created by Serres to understand his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and outlines the “Philosophy of Relations” established by Serres from the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s of “Hermès”. Based on this, Relating and comparing Serres’s thoughts on communication with those of other continental media scholars such as Debray and Krämer. Finall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Serres’ messenger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at a time when messenger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e and th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is more and more chaotic.

Keywords: Michel Serres; Hermès; messenger; noise;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Authors: Wu Jingwe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Yan Qingy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